

中国人民不允许江河自由奔流

潘家铮

中国人民在建筑大坝、兴修水利、开发水能的领域里有悠久的历史,建国以来,更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就。1997年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和黄河小浪底工程都胜利实现了截流,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与此同时,我国水工结构特别是大坝建设的技术水平也得到飞速的提高。根据中国大坝委员会的统计,中国建有8万余座大坝,占全球总数一半以上。目前正在修建世界上最宏伟的三峡大坝。在规划、设计、研究中的待建高坝大库,其数量之多、气势之宏,更是世无与伦比。今后,水利和能源都是国家建设的重点,可以证明中国水利的坝工建设正如日中天,方兴未艾。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的水利和坝工大国与强国。国际大坝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Large Dams,简称ICOLD)前秘书长柯蒂隆先生在1991年就宣称:中国和亚洲几个国家在建的坝,占全球建坝总数的绝大部分。建坝的总趋势与发展方向主要取决于中国、亚洲。印度著名水利权威凡尔玛先生更热情赞扬我国的建坝成就,他说,下世纪的坝工界将是中国世纪。ICOLD并表决通过,下一届ICOLD全会将于世纪之交的2000年在北京举行,这必将成为国际坝工史上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中国人民有理由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傲。

关于ICOLD,许多科技界同志大概都知道其名,这是一个国际民间学术组织,以交流、研讨和促进坝工技术为宗旨,是个历史较久、较活跃和有成绩的国际坝工权威组织。但是,大概很少同志会知道,在ICOLD之外还有个“国际反坝委员会”(ICALD)呢。此外还有类似的团体如“国际导向组织”(International Probing)等等。它们的宗旨只有一条,坚决反对建坝。他们人数不多,能量不小,后台有人。笔者多次率团出席ICOLD会议中,对这些“反坝分子”有过接触,并饶有兴趣地对他们的言行作了分析。

1988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ICOLD的16届大会时,他们自称已成立了一个国际反坝委员会(ICALD),租了场地,立起标牌,要求与ICOLD辩论。还学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在标语牌的D字上打以大红叉。对此,ICOLD未予置理。

1991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ICOLD的17届大会。他们雇用了一些学生(据说每人每天可得数十美元),在大会场门口摆摊、示威。口号是“让江河自由奔流”(Let Rivers Flow Freely)。我曾经问过他们:“你们反对建坝和开发水电;你们也反对我们

建火电、核电;那么我们从哪儿去取得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能源呢?”回答是:“我们相信科学家会找到解决的办法”——把球踢回给你们这些科学家。

以后的情况严重起来,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名人也卷了进去。大谈特谈大坝(例如埃及的阿斯旺水坝)的滔天罪恶。那个“国际导向”组织还宣布三峡大坝是“世界上最大的坟墓”,(顺便提一句,在“反三峡”的闹剧中,有一位戴某使尽解数,获得“国际上的赞扬”成为“英雄,并被授予“国际奖”),他们甚至宣称要把中国的总理送上他们的法庭受审。

1997年,他们在ICOLD的19届全会上(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散发了所谓“库里蒂巴(Curitiba)宣言”。据说是由20个国家中受大坝影响的受害者在巴西库里蒂巴城聚会,通过了这个宣言。并宣称:为了加强全球反坝运动,将建立、加强地区和国际联络网,决定将3月14日的“反坝斗争巴西日”定为国际反坝活动日。这次的口号是:“水是为了生命,不是为了死亡”。

宣言中说,他们赞同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世界银行关于投资大坝的表态。他们反对修建“任何不经过受害者同意的大坝”。他们要求各国政府、各国际融资组织立刻制订建坝的法律,并提出许多要求。例如,要对建坝产生的环境损害采取措施,包括拆除大坝,要求建立国际性的“独立组织”,对所有得到国际支持的大坝进行复核,各国的投资和支持建坝的部门要对每座大坝进行独立综合复查,还必须有受害者参与,……等等。

后来他们又发了个文件,宣称由世界银行与“世界保护联合会”共同赞助的一个35人工作小组(由国际组织、私人企业和受害者组成),经两天讨论,已建议成立一个高层次的国际团体来对以往、目前和规划中的建坝经验教训进行复查,提出改进的方法、政策和标准等等,还要求各国都得执行(4月11日,日内瓦)。

这些活动并非没有影响。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的坝工建设明显萎缩,除了受资源开发程度和市场需求的制约外,反坝势力的活动,无疑也起了作用。例如,某西方国家拟建一座水坝,仅仅由于未能说清建坝是否会对库区内的一两头鹿的生活环境有影响,整个工程只能无限期停顿。

对于上述闹剧,中国人民既不参与,也不理会。我们的立

场十分明确,中国人民决不接受任何束缚我们发展的无理要求。但是,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些人为什么拼命地反对建坝。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内心深处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

从表面看,他们反对建坝的理由是:水坝带来了一系列祸害,主要是生态、环境和“人权”上的问题:强迫移民、土地文物和古迹淹没、生物特别是珍稀物种损失、泥沙淤积、河床及海岸冲刷、下游水中养料的损失、水质变坏、影响渔业、诱发地震、失事风险、土壤盐碱化、疾病流行,等等。研究人类建坝历史,在某些工程上确实产生过上面列举的某些副作用,但是是否可以偏概全、不客观地分析水坝的功过得失,不理睬已经采取的各种措施,对水坝来个一棍子打死,“斩尽杀绝”,叫嚷要让河流自由奔流呢?

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一句俗语:“因噎废食”。人活着总是要吃饭的,在亿万人吃饭的过程中,总是会发生点意外的:噎了牙,噎了喉,等等。吃进不洁、有害的东西中毒、发病甚至丢命的例子更不在少数,但从来没有人愚蠢到因此而反对人们吃饭。即使将来发明了人可以直接从太阳光中摄取营养,我想人类也不会丢弃进食的乐趣和餐饮文化的。埃及的阿斯旺大坝曾成为多少人攻击的对象,并作为祸害的铁证。他们津津乐道,建坝后沙丁鱼减产了多少、海岸线退缩了多少、下游河道中肥份减少了多少、土地盐碱化了多少……,但不愿提一下它使埃及的耕地成倍增加的事实,更不愿说一在 1972~1973 年及 1979~1981 年两次非洲特大干旱中,阿斯旺水坝救了多少埃及人民生命的事。ICOLD 曾在一次年会中,就在阿斯旺所在的国家埃及,对水坝的功过得失由科学家特别是当事国的人民作了最详尽的分析和评价,包括对本可避免的失误和事后采取的改进措施的分析。中国人民在建坝过程中也同样走过曲折的路,发生过水库淤积、航道受阻、移民生活困难甚至大坝失事等情况,教训毫不比外国少。但重要的是,几十年的艰苦水利建设、几万座水坝和水库,为中国以少量耕地养活 12 亿人口、为防止大江大河溃堤出事、为保护城市和工业用水、为提供 6 500 万 kW 的清洁再生能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和科技水平,使在兴利除害过程中尽可能减免副作用,许多领域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否则,国家决不会批准兴建三峡水利枢纽的。至于说:“让江河自由奔流”,中国的江河已经自由奔流几千年了,带来的是血泪斑斑的历史:滔滔洪水使三江五湖尽成泽国,千百万人民“或为鱼鳖”;或是江河断流、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百万人的流亡;或是险滩相继、巨浪滚滚、舟毁人亡;或是人民蓬头垢面,长期过着牲畜般的生活,乃至牲畜都饥渴而死(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还仍或可见)。对于几千年来这种苦难岁月,难道还能让它再继续下去,难道能听从那几位反坝人士的叫嚣,停止我们的水利建设吗?我们的回答将是明确和坚定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江河自由奔流!

道理是这样的明显,但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呢?为什么对明摆着的事实视而不见、不讲道理呢?究竟

是什么人掀起一层又一层的风浪呢?(实际上某些人不仅仅是反对建坝而是反对一切改变现实的发展),这就不得不使我们透过表面现象,深挖一下他们的内心究竟要干什么?

参与这个反坝俱乐部的人,其组成是复杂的。有一些确是受到建坝影响的群众,更多的是偏激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公开露面或躲在幕后的政治家。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是不会受到洪涝干旱灾害的威胁的,决不会拖儿带女去逃荒,更不会没有水喝去喝马尿的。他们住在有空调和花园的幽雅别墅中,享用着牛排、奶酪和咖啡。在酒醉饭饱之余,伸出指头来发号施令:“你们不能建坝,你们不能采煤……。总之你们不能发展,再发展,地球环境就要被破坏,你们就是罪魁祸首。你们的建设必须停下来,统统的停下来”!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使今天的地球环境受到严峻挑战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是谁在几百年内通过奴役和掠夺别人,疯狂地糟塌地球的环境使自己高速发展的?又是谁目前以高于别人几倍几十倍的水平耗用着地球资源的?如果说要还债,应该由谁先来偿还?既然水坝的祸害如此之大,为什么不先拆除祸害了美国人已几十年的哥伦比亚河和科罗拉多河、田纳西河上的水坝群,而光要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建坝呢?

如果听从这些先生们的意见,把一切水利和坝工建设停下来,对发达国家、对这些先生们是没有多少影响的。他们有别墅可住、有轿车可坐、有牛排可食,每人拥有 3 个千瓦的电力(中国是每人 0.16 千瓦),每人每年消费着 3 吨石油(中国是每人 0.12 吨),已经远远超过所需额了。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怎么办呢?是不是为了保护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而永远贫困下去呢?这个问题他们从来不回答也是永远不置答的。还是由我们代他们来回答吧:“你们这些低等民族就这样过下去吧,该死去的就多死一点吧,必要时我们也会施舍一点的……”。这就是高叫人权和环保先生们的真实心理状态,事情难道不是如此吗?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无理的叫嚣阻挡不了历史滚滚前进的车轮,中国人民不会放弃改造自然发展经济的努力。中国人民将修建更多更宏伟的高坝大库、治理江河、兴利除害,要控制每一滴水为人民所用。中国人民有权利过上适度消费、富裕但不浪费的生活。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美好的言词后面往往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用心。希望我国的舆论界、生态环保界能够和科技工程界统一认识:要环境,也要发展,环保是硬要求、发展是硬道理。中国人民必能在总结国内外正反经验的基础上,做到开发和环境保护相协调、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转载自《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1998 年第 3 期)

作者简介

潘家铮 男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家电力公司技术顾问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 国家设计大师 清华大学教授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市 100038